

一 战云密布 日本阴谋 侵略扩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早在 2000 多年以前，就有中国人到达日本列岛。以后，两国人民往来不断。隋唐时期，中国经济发达，国富民足，中日交往也达到空前高涨程度。中国鉴真大师东渡扶桑，日本遣唐使到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华夏民族的风俗、服饰、饮食以及丰富绚丽的思想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即使是今天，大和民族在服饰、饮食习惯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还留存着华夏民族的遗风。两国政府间与民间的交流几乎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所有领域。纵观两国交往的历史，尽管也有过不愉快的时期，如明代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一度严重威胁了明朝的社会正常生活秩序，

迫使明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实施了海禁。但总的来说，和平友好仍是中日两国交往的主旋律。

1. 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历史的车轮进入 19 世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野蛮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贩卖黑人做奴隶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家聚敛了大批财富，而随着英、法、美等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已得到确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产品的不断增加，促使资本家们将目光转向国外，以期开拓海外市场，掠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倾销产品。要实现这些目的，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因此，他们不惜通过欺骗、收买甚至动用武力等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疯狂的掠夺殖民地狂潮。列强们的目光，早就盯上了在传说中充满黄金和其他财富的中国和日本。

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纳入了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际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气焰下，中日两国既面临外部

的压力和冲击，又经受着自身内部各种矛盾的冲突和变化，如何面对这个新的世界环境，怎样调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成为中日两国统治者亟待考虑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浑浑然以自己为天下万邦的中心。清朝皇帝虚骄自大、目空一切。朝臣更是孤陋寡闻，愚昧无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有的大臣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竟称来华朝贡的西洋人所说国名、地名都是假的，其实都是来自一个地方，不过想借此多骗些天朝的回赐罢了。在这种心态驱使下，清王朝的君臣们愈加妄自尊大，麻木不仁，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与西洋人通商贸易，而天朝生产的丝绸、茶叶等又是外邦国计民生的必需品。天下惟我独尊的统治者们仅在广州开埠，接受海外各国的“朝贡”，设点互市。清王朝长期以来实行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之水旱虫灾，粮食连年歉收，国库空虚。各级官吏为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变本加厉，巧取豪夺。他们滥设名目，将沉重的地租、赋税、徭役压在广大农民头上。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昔日繁华市镇、千里沃野，今朝已是路见白骨，野有饿殍。广大民众不堪忍受苦痛的生活，铤而走险，揭竿起义。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八旗兵及绿营兵，由于长期疏于训练，军纪松懈，斗志涣散，战斗力极差。为确保漫长的海岸线的安全，清朝也曾组织水师，但因长期奉行海禁政策，只在近海缉“匪”捕“盗”，且战船多以薄板钉造而成，年久失修，连正常出海巡逻的任务都难以应付，更何谈出海作战。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凭借船坚炮利，击垮清王朝脆弱的防御力量，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并取得割让香港、勒索巨款、强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随后，美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接踵而至，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战败的清王朝则抱定“一视同仁”的态度，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式，统统给予满足。对内，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死抱着“祖宗成法”，拒绝一切变革，不思进取。一个曾经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居世界前列的强盛的中国，此时已是危机四伏，内外交困。

2.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

当清朝皇帝做着天下惟我独尊美梦的时候，英、美、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已得到飞速发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疯狂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它们在世界各地强占领土，开拓殖民地，掠夺资源，倾销产品，加紧殖民奴役和经济掠夺。此时，东邻日本，也蠢蠢欲动。原本，差不多同一时期，同样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实行的同样是封关锁国的政策。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在长崎通商，对其他国家的通商要求一概拒绝。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队闯入江户湾（今日本东京湾），以武力打破日本的封关封国。次年，美国又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胁迫日本对美国开国。日本被迫“开国”后，英、俄、荷等也纷至沓来，掠夺了一系列特权。日本与中国一样，都面临着被压迫、遭奴役的命运。面对这一局面，日本统治者做出了与清王朝皇帝完全不同的选择。1868年，在结束了幕府统治后，天皇睦仁改元“明治”，开始进行维新，逐步解决了各地藩主的封建割据，在全国形成了中央集权

的统一局面。在外交上，日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了解国际社会，重新制定自己的政策，期望早日跻身于列强之中。君主体制的确立，使得多年蛰居京都宫中，毫无实权的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自上而下地扶植、保护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不同于欧洲列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形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农村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存，各级议会中有 1/3 议席被中小地主或大地主占据，使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由于自然、地理、人口等条件的限制，日本国内市场狭窄，资源匮乏，资本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掠夺性和侵略性。面对英美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抢占殖民地的狂潮，日本也不甘落后，积极策划，强化军事工业的发展。1868 年，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明确规定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职责是“监督贸易，开疆拓土”。在这样的侵略方针指导下，邻近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就成为其“开疆拓土”的首选之地。

1891 年，日本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政府

《施政方针》中，公然抛出要捍卫“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人们对“主权线”不难理解，涉及国家疆域版图，而“利益线”则耐人寻味。在《施政方针》中系指：凡是和日本国家疆域有“密切关系的区域是也”，而这个“区域”即指朝鲜、中国。在这种侵略方针驱使下，日本开始了疯狂的扩军奋战。由于日本是岛国，进行扩张就必须首先建立强大的海军。天皇睦仁更是从王室经费中拨出专款支持购买军舰。1892年，在法国订购的巡洋舰“松岛”、“岩岛”驶抵日本。此前一年，“桥立”舰已建成并交付日本海军。1893年，从英国购买了“吉野”号。次年，“秋津州”舰也竣工交付日本海军使用。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6万吨。陆军组建了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均配有炮兵、骑兵、工兵等，现役兵力达12.3万人，野、山炮计240门，战马3.8万匹。战时总动员兵力可达23万。为扩大军需产品生产，除强化国内军工企业，大量制造枪炮弹药外，还拨出巨资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仅1894年购买军火就花费日元达420多万。为准备发动战争，海陆军频繁进行联合或单独军事演习，而所有

这些演习，都以中国为假想敌。在疯狂扩军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朝鲜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行者，有的干脆就化装成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人文等各方面情报。大特务头子川上操六更是亲自出马，对中国的烟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实地勘察，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探查军队部署。日本间谍绘制的军用地图，将中国东北、山东半岛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土丘，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晰准确。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下了大的力量，做了精心的准备。

3. 清政府仓促备战

清王朝起先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势，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开始购置西洋船炮，以加强沿海防御能力。嗣后，总理衙门委托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在英国购买船舰，1863年，清政府耗费白银107万两，购买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组成舰队。清政府随即任命巡湖营总兵蔡国祥统

率这支舰队。李泰国为控制这支舰队，竟擅自任命英国军官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在英国本土召募官兵 600 多人，组成了一支由洋人指挥、洋人管理的洋人舰队，外国人称之为“李泰国 - 阿思本舰队”。李泰国与阿思本还私下订立合同 13 条，规定凡舰队炮手、水手及将官皆由李、阿二人选择决定；舰队只对清朝皇帝负责，其他人无权干涉；皇帝谕旨须经李泰国转达，舰队方能执行，“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等等。此举一出，朝野哗然。中国的舰队要听命于洋人，完全由洋人摆布，这是何方的逻辑，哪家的道理？就连力主买船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也表示反对。总理衙门也称：李、阿二人私订之合同 13 条，事事都由阿思本专权独断，“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经反复磋商，总理衙门决定遣散阿思本招募的洋兵洋将，命令舰队退返英国，退回已购船只，折价变卖。李泰国也因“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被免职。清政府为购船和遣散洋兵总计花费白银 160 万两，变卖船只后仅收回 51 万两，虽在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毕竟使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1871 年，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诚为全

权代表、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到中国谈判，以期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秉承日本政府既定的侵略方针，伊达向清政府提出日本应享有别国在中国已取得的一切侵略特权等条件，遭清政府断然拒绝。后经反复商谈，9月，两国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内容基本体现了平等的原则。由于在建立邦交的交涉中未能完成既定的侵略目标，伊达回国后即被免职。可见，日本与中国建交，从一开始就怀有极其阴险的目的。

1874年5月7日，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日本悍然派兵侵略台湾，清朝野震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日本竟置历史与现实于不顾，设置台湾事务局，明目张胆地要据台湾为己有。沿海疆臣，又以铁甲舰未备，难以与敌抗衡为由，畏缩不前。孤悬海外的台湾民众，得不到祖国的武力支援，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决心，用火炮、长枪、弓、刀、矛等落后武器与来犯日军浴血鏖战，予敌重创，但终难以阻挡有先进武器的日军。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岛上居民展开了游击战争，不时骚扰、袭击日军。日军虽然占领台湾，但外交上陷于孤立，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同情。加之远离本土作战，运输、给养也颇为

困难。日军士兵不服水土，军中瘟疫流行，肠胃病、疟疾患者激增。8月，全军2500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健康的，每天都有数人或十余人死亡。军中士气低落，士兵厌战，整个部队难以再战。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日本转而借助外交手段，以停战为条件，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

9月10日，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大臣的大久保抵达北京。此次日本出兵台湾，大久保是主要参与谋划者之一。至8月，日军在台陷入困境，大久保也深感难卸其责。为摆脱自己的尴尬处境，请命来华。经与清政府要员多轮谈判，签订（北京专条）三款和凭单1件，勒索40万两白银。日军也被迫应允撤离台湾。尽管日军侵占台湾的阴谋归于失败，但清政府却与之签订了屈辱的赔偿协议，再一次暴露出软弱可欺的本质。日本的这一侵略行动，使得清政府内一些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因此，总结这次事变的经验教训，加强防卫，筹组海军，迅速装备铁甲巨舰，建立新式海军，就成为清政府从日军侵台中得出的一条深刻教训。

面对危局，清政府痛下决心，决定创建新式海军。1875年，李鸿章在英国人赫德的竭

力怂恿下，从英国阿模士庄厂订购载 38 吨大炮的蚊船 2 艘，载 26.5 吨大炮的蚊船 2 艘，共耗银 45 万两。此后两年中，这 4 艘炮船分批驶回中国。李鸿章亲往大沽验收，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由于赫德把蚊船的性能和威力吹得天花乱坠，说它“精致灵捷”，用于守护海口最为得力等等，加之清政府普遍没有近代舰船知识，经不住他的一再游说，故于 1878 年李鸿章又通过赫德订购 4 只蚊船，取名“镇北”、“镇南”、“镇东”、“镇西”。但是，经过实际操练，蚊船大炮沉重，船体窄小，行驶缓慢，只宜在沿岸浅水中航行，根本不适合在大洋接战等弊病暴露无遗。由钢铁片拼凑而成的船身，“岁须两修”，花费颇巨。为节省开支，只好弃置不用，统统存入船坞，完全成为废品。无奈，李鸿章又通过赫德从英国订购快船两只，1881 年秋驶返中国，被命名为“超勇”、“扬威”。鉴于赫德多次言不符实，1880 年，李鸿章转而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伏耳铿厂订购铁甲舰 1 艘。次年又订 1 艘。1885 年，两舰驶回，命名“定远”、“镇远”。此二舰吨位相同，均为 7000 吨，航速每小时 14.5 海里。在该厂订购的一艘快船也同时返回，命名“济远”。以后

又陆续从英国购买快船两艘，命名“致远”、“靖远”；从德国购买快船两艘，命名“经远”、“来远”等，还购置鱼雷艇 7 艘。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至 1888 年 9 月，北洋舰队已拥有大小舰艇近 50 艘，总吨位约达 5 万吨。规模初具。

为筹组新式海军，在购买船舰的同时，李鸿章着手组建海军机构，着力培养海军人才，建立海军基地。1879 年，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专门负责处理北洋海军的日常事务。第二年，又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为北洋海军培养急需的驾驶人才。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舰船等级、编制、人员、俸饷及员弁升擢规则，每 3 年会操一次。1881 年，奏请任命丁汝昌为提督，统率北洋舰队。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幼时家境贫寒，曾参加太平军。后投入湘军。1864 年，任副将。1868 年任总兵，加提督衔。后转投李鸿章门下，留北洋海防差遣。1880 年，赴英国统带“超勇”、“扬威”两快船驶返，得到李鸿章的信任。1882 年获头品顶戴。次年，任天津镇总兵。1888 年 12 月，升任北洋海军提督，统率大小舰只 40 余艘，并设北洋海军衙门于刘公岛。

为加强海防，清政府在旅顺口、大连湾、

威海卫建立防御设施，修筑炮台。经数年苦心经营，将威海卫这一天然良港建成北洋舰队停泊的大型军港，并在旅顺口营建一大型船坞。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实际上，北洋海军大权操纵在李鸿章手里。自此，李视北洋舰队为私人财产，拥兵自重，并不认真筹备战事。北洋舰队组成后，清政府即停止购置新舰。奕譞为讨慈禧欢心，将海军经费挪用，为慈禧太后大修颐和园。北洋舰队成立之日，亦即停止发展之时。至甲午战前，中日海军力量对比，北洋舰队无论在总吨位、大炮数量、航速上都明显居于劣势，连李鸿章也深感“后难为继”。北洋舰队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二 不宣而战 日军发动 侵略战争

1890年起，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日本社会也呈现经济危机征兆。棉布、豆油生产下降，粮价暴涨，外贸逆差增加，工人失业，广大民众处境恶化。以伊藤博文为总理大臣的内阁与议会之间矛盾不断扩大，冲突加剧，内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议会的不信任案，伊藤只有辞职或第三次解散议会这两种选择。鉴此，为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摆脱困境，避免垮台，寻机发动侵略战争，便成为摆在伊藤内阁面前的当务之急。外相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称：“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般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也是不可能的。”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也表示，“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

们宁愿反华战争”。正当伊藤焦急万分，千方百计寻找对策之际，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的内乱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伊藤遂不顾一切，抓住这个机会全力发动侵朝战争。

1. 东学党起义

东学道，即“东学教”。“东学”即“东方之学”，因与西方传教士传播的“西学”——天主教相对抗而得名。朝鲜教徒们在民间流传的天道教、侍天教基础上，补充了儒教、佛教、道教的内容，以“诚”、“敬”、“信”三字为东学教义，使得东学教更符合现时的社会情况，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因而颇具号召力。此时的朝鲜，由于统治集团政治腐败，官吏穷奢极欲，人民生活艰难，怨声载道。东学道的创立，在精神上极大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几年时间，信徒遍及全国。东学道发布的揭帖，具有强烈的反侵略特色，斗争矛头直指日本，提出了“除暴救民”、“扫破倭洋”的口号。1894年1月，倭古阜郡东学道首领全琫准率众起义，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民众群起响应。义军纪律严明，深受百姓欢迎，大批青

壮年纷纷加入，使得义军声势大振。全琫准率义军攻城拔地，所到之处，开仓分粮，救济民众。义军屡屡击溃前来镇压的官军，并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开仓赈济贫民，烧毁借据契约，建立农民政权——“执纲所”。义军浩大的声势，使得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限于自身的力量，万般无奈之下，朝鲜国王下决心向清王朝求援，“借兵助剿”。6月3日，朝鲜国王派特使将乞援书送至清王朝驻朝鲜通商大臣袁世凯处，请求清政府“酌遣数队，速来代剿”。袁世凯迅即电告李鸿章。

本来，清王朝与朝鲜只具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实际上不过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清王朝有保护朝鲜安全的义务，而朝鲜向清王朝“岁时进贡”而已。藩属国在内政和外交上享有独立主权，远非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可比。清王朝处理与朝鲜、越南这类藩属国的交涉事务时，也统归礼部，而不是像处理蒙古、新疆事务那样归理藩院管辖。所谓宗藩关系，最主要的是当藩属国遇到内忧外患，乃至威胁其国家安全时，清政府才会给予援助，而这种援助，往往是在藩属国国王的请求下才会答应。历史上，在明代，中国就曾应朝鲜国王请求而出兵，与朝鲜军民共同抗击日本对朝鲜